



# 求真之路

——记一位经济学家的人生旅程

申景瑶 著

# 求真之路

——记一位经济学家的人生旅程

申景瑶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责任编辑：金 梅  
责任校对：段健瑛  
封面摄影：柳 快  
封面设计：张卫红  
电脑制作：张卫红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舒天安

## 求真之路

——记一位经济学家的人生旅程

申景瑶 著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出版社电话：62541886 发行部电话：62568479

经济科学出版社暨发行部地址 北京海淀区万泉河路 66 号

邮编：100086

\*

850×1168 毫米 32 开 6.5 印张 160000 字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58-1216-5/F·865 定价：16.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求真之路:记一位经济学家的人生旅程/申景瑶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7

ISBN 7-5058-1216-5

I. 求… II. 申… III. 董辅弼-生平事迹 IV. F825.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2655 号

97058/1216-5

# 目 录

引子 走近董辅弼 .....	( 1 )
第一章 生命的重量 .....	( 4 )
第二章 初踏经济学之旅 .....	( 13 )
恩师引路 .....	( 14 )
求真读书会 .....	( 19 )
寻找光明 .....	( 24 )
入党 .....	( 31 )
踏上经济学之路 .....	( 38 )
第三章 在莫斯科的日子 .....	( 44 )
留学 .....	( 45 )
重要人物出场 .....	( 51 )
第四章 出世作学问 .....	( 55 )
归来好困惑 .....	( 56 )
北京,新的开始 .....	( 61 )
经济无学的年代 .....	( 66 )
经济增长论 .....	( 70 )
三里河的家 .....	( 76 )
第五章 荒废十二载 .....	( 82 )
从生产价格到利润挂帅 .....	( 83 )
八大员干将 .....	( 89 )

蜿蜒“五·七”路 .....	(95)
等待 .....	(101)
<b>第六章 经济学的春天 .....</b>	<b>(107)</b>
复苏 .....	(108)
与于光远同行 .....	(111)
经济学初见曙光 .....	(116)
石破惊天之举 .....	(121)
“五十秉烛” .....	(128)
与世界沟通 .....	(133)
<b>第七章 耕耘的时节 .....</b>	<b>(141)</b>
经济研究所所长 .....	(142)
温州冲击波 .....	(149)
导师 .....	(154)
一篇硕士论文与十几封信 .....	(161)
倡导市场经济 .....	(169)
<b>第八章 不老的老人 .....</b>	<b>(174)</b>
六十授勋 .....	(175)
独特的风格 .....	(179)
平常心 .....	(183)
<b>尾 声 他属于中国 .....</b>	<b>(194)</b>

## 引子 走近董辅弼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1959年他出版第一部专著《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一书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于一些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他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发表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其中有许多主张和见解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而且得到了国家有关决策部门和立法机构的采纳。

他曾经是武汉大学经济系讲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业务行政领导小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他又是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亲自主持了《期货交易法》的起草工作。

他的名字叫董辅弼。

也许经济学界以外的人并不熟悉这个名字，但从他的思想中凝炼出的一个又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与观点，对于许多人来说，却是不陌生的：

1978年，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了要实行“政企分离”和“政社

分离”，改革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建议；

1980年提出：改革应该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即“所有制改革”和“运行机制改革”，同时还提出关于改革“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实行分税制的建议；

改革一开始，就主张引入市场机制，主张由市场调节经济的运行。不赞成“两个调节”，而主张“一个调节”，即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主张取消指令性计划。一直反对把指令性计划与市场捏在一起的“双重体制”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不赞成让市场发挥辅助作用；

1985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

90年代初，又提出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分别不同类型改革国有企业的观点；

1994年，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的结合。并指出，在由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更容易发生市场秩序的混乱，会出现调节的真空地带。

这些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中不断出现的观点、名词和理论，都与同一个名字连在一起——董辅弼。

他是一个不平凡的经济学家，又是一个平凡的老人；他住在北京一个普普通通的居民小区的一幢老房子里；他和所有同龄人一样，经历了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然而，他用自己已经走过的七十载人生历程，为他的祖国的经济学研究和实践踩下了一条开拓的小路，尽管这条路上有泥土、沙石，有汗滴、血痕，但它毕竟是一条通向成功的路。

如今，面对白发苍苍的董辅弼，和他坐在一起回顾70年的人生，这幅长长的生命画卷向人们展示了一种顽强的美，那是中国经济界学人在战火中，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始终



不改的对事业的忠诚之美！

尽管他身上没有太多的传奇故事，但他从一个天真少年到大学里的地下工作者，从一名留苏学生到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的成长历程，却为后来的人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董辅弼一路走来，与他的同行者们一道，为新中国的经济学写下了壮美的一笔。特别可喜的是，他看到在他们这一代经济学人的身后，已经崛起了许许多多年轻的、健壮的后来者，他们比他走得更稳，走得更快。而对于经济学界以外的人们而言，寻着董辅弼走过的足迹，寻着这些经济界学人走过的足迹，便可以多少看到一部中国经济的发展史，一部中国经济学家的奋斗史。

让我们走近董辅弼，走进他的生活，他的天地，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 第一章 生命的重量

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肥沃的土壤，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会结出丰硕之果，产生世界性的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著作。试想，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许多复杂而又困难的经济问题需要人们去研究去解决。如果谁能透彻地研究了、解决了其中任何一个重要问题，岂只有中国的意义？世界各国如此瞩目中国开放改革，又岂止属偶然？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是幸运的。而我恰有幸跻身其中。

——董辅初

1977年，董辅弼整整50岁了。

他没有想到，在自己50岁的时候，竟然能和他的祖国一道走进又一个灿烂的季节。

1977年的中国，刚刚走出“十年动乱”的阴影，人们的心情经过长久的压抑之后，终于可以在春光中尽情地放松一下，当新鲜空气吹进一个个坐封已久的心田时，他和同行者们再也无法抑制工作的冲动，研究的欲望，他们的头脑已经被闲置得太久了，他们的嘴和手中的笔已经被封杀得太久了。当时，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

此时，董辅弼已经工作了18年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已瘫痪多年，尽管一些研究人员还在这里上班，但这里即没有研究室，又没有研究课题，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成员除了能组织大家搞点政治学习外，业务方面就一窍不通了。国家经济建设百废待兴，作为先行的经济研究工作再也无法坐视光阴流逝。为了使工作能够尽快地恢复起来并走入正轨，哲学社会科学部新来的领导来到经济研究所，准备重建领导班子。鉴于当时的情况，没有采取指名任命的方式，而是搞了一次地地道道的民主选举。

那一天，经济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集聚到会议室开会。院领导讲了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选出一位大家信得过的、懂业务、会领导的带头人，把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真正抓起来，领导大家尽快地干出成绩，干出水平。选举不提任何候选人，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一会儿的工夫，选举结果统计出来了，得票最多的人就是董辅弼。

这样，他就被任命为“十年动乱”之后，经济研究所的第一位领导人——业务行政领导小组的组长，负责经济研究所的业务

和行政工作。从此，他才真正作为一名“入世”的经济学家，开始了生命中最辉煌、最忙碌、最充实、最有成就感的20年。

1976年底，当时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带领董辅弼等到上海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1976年之前，“四人帮”曾在上海组织编写了一本书，名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本书完整全面地反映了“四人帮”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只是书稿刚刚印出来，还没来得及发行，“四人帮”就垮台了。为了突破以往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种种束缚，建立新的经济理论体系，于光远等人的任务是，亲自到上海取回这本书，然后，组织经济理论界人士对此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从思想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

冬季的上海是很冷的，但是，于光远和董辅弼的心中却热乎乎的。于光远是上海人，而董辅弼的祖父也在上海滩谋过生计。他们二人相识已久，同样有活跃的思想，高涨的工作热情和对于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如今又共同肩负重任，为共和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而奔波忙碌。特别是对于董辅弼来说，能够和于光远这样一位既是师长，又为朋友的人在一起工作，真是一件极大的幸事。

夜已经深了，上海滩变得寂静、安详。然而，于光远和董辅弼却难以入眠。他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这半生中，经过了战乱，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又经历了此后的种种政治风云，到如今，两鬓斑斑，而一切却仿佛刚刚开始。

此刻，董辅弼深深感到时间的紧缺，更慨叹那50年时光流逝匆匆。不远处，长江在黑夜里浩浩荡荡地汇入了大海，尽管他听不到那轰轰的水声，但是他可以感受到长江那最后的欢快——江河最终是在大海里找到永恒的。那么自己呢？人生的河已在不知不觉中流过了中游，而属于自己的海又在哪儿呢？当睡意一点点爬上心头的时候，他恍然看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是他生命之河的

发源地，那是他希望返回却永远无法返回的过去。

1927年7月26日，董辅初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女孩，这个男孩子的到来更给全家带来许多惊喜与欢乐。父母笑迎着道喜的人们，可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怀中这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日后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都很著名的经济学家。

董辅初的祖父母家原本居住在浙江省镇海县大碇头镇。宁波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他的祖父在年轻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的大门被外国列强敲开，大量的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大陆，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受到巨大冲击，当时许多江浙一带的农民纷纷离开祖辈生活的红土地，到城市里去感受一种新的生活。他的祖父就是随着这股人流到了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大都市——上海。到上海以后，他的祖父在一家百货店里当上了店员。那时都是男人到外面做工，女人、孩子在家里守着房子和土地，所以董辅初的父亲董浚敏小的时候是在乡下生活、读书的，大了以后才到上海继续读书。在读书的时候，董浚敏就接触了许多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而且学了英语。毕业后，董浚敏作过英文秘书，教过中学，在邮局工作过，后来进了宁波人虞洽卿办的“三北轮船公司”。

董辅初的祖父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逆江而上，到了汉口，在那里的一家木器店里当店员，直到年纪大了才回镇海老家，抗战胜利后去世。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他的祖父不仅略通经商之道，还能讲一些英文。而他的外祖父，年轻的时候在轮船上工作，往返于宁波和上海之间。董辅初的母亲赵诀影是一位宁波城里的小姐，住在一幢漂亮的房子里，因为家里有钱又开通，所以女孩子也同样被送到学校读书。以后赵诀影没有外出工作过，一

生只扮演一个角色——家庭妇女，养育着她的孩子们。

几十年后，当人们知道了“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董辅弼，知道了那个最早提出应该实行“政企分离”和“政社分离”的董辅弼时，大概还很少有人知道，家庭对于成就后来的他起到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具有如此背景的一对父母走到了一起，建立起一个既新派又不失中国传统美德的家庭，董辅弼幸运地生长于这样的家庭。已是古稀之年的他至今忆起父母和家庭，仍然充满了幸福和满足。他说：“我父亲是个大老实人，谎话都不会说。父亲、母亲都信佛教，父亲初一、十五是要吃素的。父亲不吃牛肉，他说杀牛的时候，牛会流眼泪，太可怜了，所以不忍心吃牛肉。”是啊，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但的确父母那诚实、善良的品质已经作为一种天性流传在他的人格之中，在整整70年的人生旅途中，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他总是能诚实地作学问，诚实地做人，以善良之心面对朋友和学生。

董辅弼生长在一个和睦、欢乐、平等的家庭中，父亲一生喜好诗词书画，悉心收集古董文物，兴致上来了，还会让太太点一炷香，在香烟缭绕中弹几曲古琴。董辅弼记得，小的时候家里给他们买很多书，中国的，外国的都有，他们兄弟姐妹随时可以拿自己想读的书来读。司马光的故事等等，至今依然清晰，特别是那个“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更是印象深刻。这样的家庭氛围，使儿时的他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很早就开始识字，笔墨与书卷是他俯拾即是的伴侣，每到寒暑假是必须要练字的，尽管对于爱玩的孩子来说，当时不免有几分不愿为而为之的色彩，但从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却伴随他走过了以后的漫漫人生路途。现在看来，早年的耳濡目染已经奠定了他日后走求学兴国之路的坚实基础。

1937年，平静、快乐的儿童时代结束了。这一年，10岁的董

辅弼和他的祖国一起卷进了一场大的动荡，这是他人生中所经历的第一次大动荡——日军大举侵华，抗战全面爆发。而在这之后，一个接一个的动荡便接踵而来，董辅弼像一个孤独、勇敢的泳者，在风谷浪尖上挣扎着，拼搏着，高呼着，以他的才华和勇气在中国经济学这个不平静的港湾中树起了一面面大旗。当然，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对于1937年那个年仅10岁的小男孩来说，战争是恐怖的，流亡是艰辛的，未来是莫测的。

在前方军事屡屡失利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当时，为了逃脱日寇铁蹄的践踏，多少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含着热泪，告别家园，他们携妻将子，分水路和陆路向当时的大后方——四川一带转移。1938年在入川的各个通道上，数条艰难地蠕动着的人流形成了绵延千里的奇观，董辅弼的家人就夹杂在这样的人流之中，好在董浚敏是在轮船公司做事的，他们一家坐着船，很快就到达了四川宜宾。但没多久，又举家搬往重庆，在重庆总算安顿下来了。蜀道之上的重山峻岭和前方将士的血汗生命保全了这一方国土，但战火硝烟却始终在巴蜀上空萦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放下平稳的书桌。青年的董辅弼就读于重庆西郊永川国立十六中学。当时在十六中的同班同学中，他与聂壁初（曾任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长）、庄练非、张曰强、崔云龙最要好。中学毕业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和友谊。那时候的孩子，除了读课本上的知识以外，更关心时局，而重庆又是国共双方展开政治斗争的前沿，中学生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对国共两方也有不同的倾向。为了了解时事，他订阅了《新华日报》等报纸，从那里看到了共产党的主张，也了解了国民政府的方针，动荡的时局锻炼着一个少年的思辨能力。

在董辅弼家附近，有一个生产皮鞋胶底的小工厂，有空的时候他就跑到那里去与工人们聊天。在工人中有一些进步分子，相处得时间久了，他们就拿一些进步书籍给董辅弼看，可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认识就是在这种朦胧的接触中获得的，尽管这种接触与认识并不系统、全面，但却像一条红线，牵着他的心，使他在武汉大学的求学过程中没有坠入象牙塔而不能自拔。在人的一生中，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迈出的每一步都会对他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经历和阅力的增加，到中学毕业的时候，董辅弼已经完全脱离了孩子的天真与浪漫，成为一个勤于思考的年轻人，从此，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董辅弼，面对破碎的山河，潜藏在他心底的那份忧虑在不断地上升、上升……

由于任务的紧急，于光远和董辅弼他们没有时间在上海过多的停留。他们很顺利地拿到了“四人帮”组织人编写的那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样，便匆匆忙忙地返回北京。在回京的火车上，于光远和董辅弼心中已大体有了一个从经济理论上揭批“四人帮”的脉络。

回到北京之后，在于光远的领导下，董辅弼开始具体操作这项大规模的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首先在经济研究所内组织北京和外地的理论界人士开批判会，每两周组织一次，大家交换看法，相互探讨，以把整个揭批工作引向深入。

由经济研究所发起的这次揭批活动整整持续了二年多，影响很大，加快了经济理论界的解放思想的进程。1978年，在全面揭批的基础上，由董辅弼作主编，有关人员集体编写了一本系统批判“四人帮”经济理论体系的专著——《“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次年又出版了修订本。



这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经济谬论的著作。

作为主编，他在修订版后记中写到：“四人帮”的这套极左经济理论，大体上早在1958年张春桥所写的《去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陈伯达鼓吹取消商品生产时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最后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一套理论。他还把“四人帮”的经济理论体系归纳为这样几句话：以历史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臆造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为出发点和黑线，以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胡诌为媒介，歪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论证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为基本任务，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供理论根据。

批判是为了总结过去，但更是为了探讨后来的路该怎样走，这是董辅初所主编的这部书对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思想界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从“四人帮”主持编写的这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整个极左思潮的特点出发，总结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应该吸取的教训，以及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他把这些极左经济理论归纳为十点：

- (1) 经济学论著成了语录的汇集和注释。
- (2) 经济学著作不对客观过程作切合实际的科学分析，充斥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和政治说教。
- (3) 许多经济学科政治经济学化了。
- (4) 经济学科简单地配合政治斗争，否定了自己的科学性和独立性。
- (5) 经济学科混同于宣传工作，用经济政策宣传取代科学研究。
- (6) 盲目自大地认为我国经济处于世界顶峰，隔绝了它同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发展的联系，不能从中吸取营养以发展自己。
- (7) 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简单地扣政治帽子，不做科学地分析和批判。
- (8) 经济科学领域布满陷阱，许多理论成了禁区。
- (9) 经济科学中的数量分析被视为资产阶级研究方法或数学游戏。
- (10) 把唯物辩证法看作唯一方法，轻视和排斥其他方法。